



**JMLC**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MLC*, Vol. 1, No. 1, 2026, pp.1-8.

Print ISSN: 3107-1821; Online ISSN: 3107-183X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l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1.01>



## 中国海洋文化自主知识理论体系的建构之路 ——曲金良教授访谈录

刘爽 (Liu Shuang) 曲金良 (Qu Jinliang)

**摘要:** 本文是对曲金良教授的学术访谈，系统展现了他在中国海洋文化自主知识理论体系建构方面的学术贡献。曲金良教授深耕海洋文化研究三十余载，坚守“为中国海洋文化立学、为国家海洋战略立言、为中华文化自信立据”初心，从学科空白处起步，在文献浩瀚中深耕，于国际学术对话中发声，完成了从“搭框架”到“建体系”、从“做基础”到“促应用”、从“国内深耕”到“国际传播”的全链条学术探索。其成果填补国内海洋文化学科多项空白，服务国家海洋强国建设大局，推动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显学”。本次访谈围绕其治学历程、核心研究、学术坚守、现实反思与未来展望诸话题展开，展示了一位学者践行文化自信、学术自觉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 中国海洋文化；基础理论；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立场

**作者简介:** 刘爽 (通讯作者)，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西班牙文学、海洋文学与文化、跨文化传播。电子邮箱：liushuang72@ouc.edu.cn。曲金良，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海洋文化理论、历史和遗产研究。电子邮箱：qujinliang@ouc.edu.cn。

**Title: The Path to Building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Independent Chinese Marine Culture: An Academic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Qu Jinli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n academic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Qu Jinliang. It covers his academic journey, core research, and systematically reviews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ine culture to build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Professor Qu has been engaged in marine culture research for over 30 years. His research achievements

Received: 28 Mar 2026 / Revised: 18 Apr 2026 / Accepted: 25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Apr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May 2026.

have filled many gaps in domestic marine culture studies, propelling Chinese marine culture to become a prominent discipline with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Centered on his academic perseverance, this interview showcases the spiritual journey of Professor Qu's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academic consciousness.

**Keywords:** Chinese Marine Culture; Fundamental Theory;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China's Academic Position

**Author Biographies:** **Liu Shuang**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specializing in Spanish Literature, Marin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mail: liushuang72@ouc.edu.cn. **Qu Jinliang** a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Marine Cultur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primarily engages in research on marine cultural theory, history, and heritage. E-mail: qujinliang@ouc.edu.cn.

**刘爽**（以下简称“刘”）：曲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您曾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还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得者。您深耕海洋文化研究三十余年，可以说是国内海洋文化学科奠基人与引领者，是国内该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很多青年学子初次接触海洋文化，都是从您主编的教材入门，而您最初踏入这片领域时，却面临着“学科空白、认知偏见”的双重困境。能否先和我们聊聊，当年您是如何下定决心投身这一几乎“从零起步”的领域？早期研究中，有没有让您至今难忘的挑战与经历？

**曲金良教授**（以下简称“曲”）：谢谢。其实我最初的学术方向并不是海洋文化，而是中国文学、民俗学。真正转向海洋文化，源于1990年代初的一次学术交流与一次“思想冲击”。那时候我刚来校任教，并没有“海洋文化”意识，更谈不上学术自觉。中国海洋大学要搭建人文社科体系，邀请了几位海外学者来做讲座。其中一位西方学者当着我们的面说：“中国是典型的大陆文明，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文化，所谓的海上活动，不过是朝贡贸易的附属品。”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海洋大国，何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文化”？什么样海洋文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文化”？是西方人说了算，还是中国人说了算？西方学者的文化傲慢与偏见是伤人自尊的。中国学界和思想文化界的“河殇”思潮虽然已经褪去，中国的“黄河长江”、“农耕文明”等已回归“正面形象”，但需要“立”的“中国海洋文化”从概念到实体尚未立起来，更谈不上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矫正”西人的“成说”，影响进而引领世界认知。

事实上，那时候我的“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海洋大国”认知也只是一个“约略”概念，因为中国学人那时尚未有对“海洋文化”的“学术自觉”研究，所以尚无法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实证”上将这一“约略”的概念“坐实”。正是在这样的“刺激”下，我才开始“自觉”对“海洋文化”、对“中国的海洋文化”的概念与实证、历史与理论进行系统的知识“饿补”与建构思考的。

**刘**：您的治学历程，几乎完整见证了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从“无人问津”到“成为显学”的全过程。您曾将其分为“奠基期、体系构建期、战略化与国际化拓展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标志性的成果。能否结合具体的研究事件、团队协作与成果落地，为我们详细讲讲这三个阶段的核心探索与突破？

曲：好的。这三个阶段不是割裂的，而是一步步深化的过程，每一步都离不开学校的大力支持、学界的相互激发与合作、团队的共同创新努力，也离不开国家战略、时代发展的机遇。

### 第一阶段：学科奠基期（1990年代中后期）——从零起步，搭建学科骨架

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海洋文化”从一个粗略甚至是模糊的概念，变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从1995年开始“产出”海洋文化研究的初步成果并在学校学报社科版开辟“海洋文化研究”专栏以有意引领学界，到1996年向学校提出创建海洋文化研究机构以组建团队创建学科、培养人才，到1997年海洋文化研究所正式设立、学术团队开始组建，1998年开设海洋文化通识课程并组编《海洋文化概论》教材、《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年刊，1999年出版《海洋文化概论》和《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第一卷。旋即，1990年代末，国内不少涉海高校、院系开始尝试开设海洋相关人文课程，《海洋文化概论》和相继出版的各卷《中国海洋文化研究》遂成为教材或参考教材、参考文献的必选。《海洋文化概论》后来不断再版（重印）不下十数次，被多所高校选为本科生教材、研究生必读书目与参考文献。

当初编写《海洋文化概论》，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工作是核心概念的界定。当时西方的海洋文化概念，核心是“海洋霸权、殖民扩张、海上贸易垄断”，如果直接拿来用，就会歪曲中国的海洋历史。所以我们反复讨论，从中国本土和世界各民族各区域海洋文化的历史事实出发明确了“海洋文化”的定义：海洋文化是人类在与海洋的互动中形成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海洋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等互为一体的各个层面和各有机构成；基于各区域不同的海洋资源环境和不同的社会发展条件与主客观需求，世界上各区域的海洋文化具体不同的特性与表征。缘是，中国有着自己不同于世界其他区域尤其是不同于西方的海洋文化——在与世界各区域海洋文化互联互通互动中不断丰富、发展包括内涵与空间的发展与强大。

### 第二阶段：体系构建期（2000–2010年代）——文献集成，夯实学科根基

进入21世纪，海洋文化学科逐渐有了雏形，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学界越来越重视，海洋文化相关研究越来越多，但文献零散，叙事混乱，很多研究都是“各说各的”，没有统一的主体史料支撑，不少研究难免“走偏”。所以这一阶段，我们的核心任务是“整理文献、构建体系”，让海洋文化研究有扎实的基本史料基础。这一时期我们的代表性的成果，就是《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和《中华大典·海洋分典》。

先说说《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2003年，我们正式启动这个项目，组建了以海洋文化研究所同事为主体的学术团队，前前后后整整做了十年。最大的挑战是“文献整合”，我们要把从先秦到近代的海洋文化相关文献、相关学界尤其是相关史学界方方面面领域的已有研究著述全部梳理出来，还要从“文化维度”而不是“经济维度、政治维度”作出解读。比如，以前史学界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方面面，学科分到三级，较窄较细，大多见到的是作为“海洋文化”历史整体的细节、局部，而难见全貌。《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编写的宗旨，就是力求反映这种全貌。即在“中国海洋文化”的整体概念和整体历史发展视域下，力求全面系统汇总集纳整理方方面面的历史文献和方方面面相关学界学者已有的“细节”“局部”研究成果，就当时所见，“汇天下书为一书”，或取或舍，当

然反映出的是我们的中国立场、中国观念、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构建的是我们的中国海洋文化历史的基本理论。

从 2008 年出版第一卷，至 2013 年，五卷本《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全部出齐，总字数 310 万字。出版后，学界有评是“中国海洋文化史研究的里程碑”。2015 年，这部书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这也是国内海洋文化领域首次获得该奖项。它为后来的海洋文化研究提供了完整的主体史料支撑，很多学者做研究，都要以这部长编为基础，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夯实根基”。

再说说《中华大典·海洋分典》。《中华大典》是国务院立项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将中国的海洋文献列入中华文献大典，国家编纂，这对于开创未久的海洋文化学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学术盛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第一次有了“国字号”的历史文献集成。2010 年我们接手这个项目，团队齐心协力，集体攻关，力求把关于海洋的历史文献从历代经史子集、地方文献中“全部”整理出来，分类编纂。其间甄选版本、作者、史实、观点，去伪存真，去邪存正，或取或舍，颇费周折。初稿 800 多万字，最终定稿约 300 万字，2016 年《中华大典·海洋分典》正式出版，被视为国内海洋文化研究的权威工具书，为学科规范化发展打下了基本文献基础。

### 第三阶段：战略赋能与国际化拓展期（2010 年至今）——对接国家海洋发展战略。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海洋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的研究如何服务国家战略，并“走出去”，“走”得好，让中国的海洋文化话语、海洋文化形象在国际上“站立起来”，并“高大起来”，是我们必须重视、为之努力的时代命题。

这一阶段，我们主持了一系列国家课题，比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体系研究》，我们的学术目的就是突破西方理论框架，构建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理论体系。我们提出了中国海洋文化不同于西方海洋文化的一系列核心概念，系统阐述了中国海洋文化的基本内涵、核心价值、发展规律与和着眼于当下与未来的实践路径。

为了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和国家相关决策，我们申报获批主持教育部社科发展报告项目《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报告》，以年度报告的形式编写出版，每年对全国海洋文化发展状况进行系统评估，提出对策建议，得到了国家和地方文化部门、海洋管理部门和相关学界的高度重视。这一系列研究报告共编写出版了 5 卷，其后因教育部将社科发展报告系列统一结束立项，不再编写出版，遂转为学校支持的“蓝皮书”，仍名《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报告》，由团队每 5 年编写出版一卷。

我们关于妈祖文化的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相关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为两岸交流提供了学术支撑；我们关于钓鱼岛、琉球群岛问题的立项研究和成果产出，为国家维护海洋权益、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历史与文化依据。在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国际影响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我应邀赴韩、日、美、英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术合作交流 100 余次，团队成员与日、韩、美、澳等国和我国港澳台地区交流合作都是经常性的。我们的海洋文化研究与人才培养首先影响了韩国、日本的相关学界和高校，他们与我们合作，海洋文化研究也迅速开展了起来，中韩日三方海洋文化研究合作交流不断，包括合作成立机构、举办学术会议、编译学术论著、相互邀请合作研究、本科生研究生互派访学等等。我主编的《海洋文化概论》、以此为基础研究独著的《海洋文化与社会》，都被韩国学界同行在韩国翻译出版。我和研究所同仁经常性受邀赴韩赴日作

短期、长期客座教学研究；由韩国海洋大学积极主动发起成立的以中韩日十多家海洋文化相关研究机构为主体的“世界海洋文化研究机构联席会议”暨不同主题的海洋文化国际会议，在中韩日各方轮流举办多年。

我们的海洋文化研究与人才培养也相继影响了西方相关学界和高校。以西方学界为主体举办多届的海洋历史、海洋经济史、海洋考古等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主动邀请我们出席并作主旨报告；西方学者主编的《世界海洋历史百科全书》邀请我们撰稿；2006年合作主编出版的中英文著作 *China Ocean Culture*（《中国海洋文化》）作为中欧基金项目成果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涵、历史与价值，由基金会欧方发行。2009年作为中美建交30周年系列学术研讨会之一，由我组织、中国海洋大学与美国德州A&M大学合作主办的中美双边海洋文化遗产论坛在北京举办；2010年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局（NOAA）举办美国海洋文化遗产年会，邀请我为他们作“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现状与未来”的特别学术报告。后来我的《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一书，也被多国出版机构以多语种签约翻译出版。

这说明，西方人的文化傲慢与偏见缘于我们自己的不自觉、不自信、不作为；只要我们努力做，以我们的主体意识、学术自觉、文化自信建构我们自己的自主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就会为中国、为世界海洋文化正名、纠偏，被无视、抑或被颠倒了的中国海洋文化历史就会在世界认知上再颠倒回来，世界海洋文明、海洋文化的当下和未来发展就有可能、有希望拨正良性的和平和谐美好的方向。

**刘：**您主编的《海洋文化概论》和《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是海洋文化学科的两大基石，前者搭建了理论框架，后者夯实了史料基础。能否结合这两部著作的具体编写细节、核心观点，再为我们讲讲您是如何坚守中国立场、践行文化自信的？

**曲：**这两部著作，其实是“一体两面”的：《海洋文化概论》解决“是什么”的概念问题，《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解决“怎么样”的实证问题，两者都始终坚守中国立场，是中国文化自信自觉自信的呈现。

编写《海洋文化概论》时，我们首先坚持的是“本土视角，拒绝照搬”。当时西方的海洋文化理论，除了西方中心主义，还有“海洋中心主义”，强调海洋对陆地的主导，而我们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提出了“海陆并重、海陆互补”的观点，系统阐明中国的海洋文化，不是西方那种“以扩张为核心”的海洋文化。

为了体现文化自信，我们在教材里大量使用中国本土的案例，用西方的案例作为比照。比如讲“海洋渔业文化”，我们用的是中国沿海的“渔汛制度”“海洋禁忌”；讲“海洋航运文化”，我们用的是中国古代的海上漕运、中外航海封贡、贸易和市舶管理、民间海商网络；讲“海洋精神文化”，我们用的是中国的“四海一家”的“天下”理念，“海不扬波”的海洋和平追求，海上蓬莱、妈祖、海神、龙王等民生神佑的海洋信仰。如此等等，都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元素，也都是我们足以增强民族自尊、坚守文化自信的“资本”。

《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坚守主体本土叙事，拒绝“他者”歪曲。我们完全以中国本土的史料、考古发现、文化实践为依据，构建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叙事，而不是用西方的历史分期、评价标准来套中国的历史。

比如，在讲“明清海洋文化”时，西方学者往往强调“海禁政策扼杀了中国海洋文化”，但我们的研究发现，海禁政策恰恰是明清时代应对海疆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维护中国与海外世界的宗藩制度、对中外海上贸易进行有序管理、限制长期贸易出超、制止海上走私偷渡的必要手段。这就打破了西方学者有意无意的歪曲误读。

**刘：**您主持了十余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课题，涵盖理论体系、文献集成、海洋权益、文化遗产等多个维度，其中很多课题直接服务国家战略。能否挑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课题，详细讲讲研究过程中的具体探索、核心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如何落地？

**曲：**好的。课题研究的宗旨，就是学术问题与国家需求相结合、相统一，既要做“书斋里的学问”，也要做“落地的学问”。

例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体系研究》**。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推进，国内海洋文化研究越来越多，但一直缺乏一套系统的、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很多研究还是沿用西方的理论框架，这就导致“研究多、共识少”的问题。所以我们申请了这个重大项目，核心目标是“构建中国自主的海洋文化理论体系”。

我们提出了“本体论—价值论—发展论”三维框架，从“中国海洋文化“是什么和怎么样”“有什么价值和功能作用”“如何发展”三个层面展开研究；“如何发展”研究就是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研究海洋文化如何对内面向国家海洋强国建设，对外面向“一带一路”、面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暨“海洋命运共同体”、面向海洋和平和“天下大同”的发展。

再如**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海峡两岸妈祖文化交流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妈祖文化是全球华人普遍传承的海洋信仰，也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内涵和纽带。我们开展这项研究，旨在推动两岸妈祖文化交流高质量发展。

我们团队多次往返两岸，深度调研了台湾省的北港朝天宫、大甲镇澜宫等知名妈祖庙，以及福建的湄洲妈祖祖庙、泉州天后宫等，参与了相关活动，与两岸妈祖文化研究者、信众、管理者进行了深入交流。我们发现，台湾省妈祖文化更注重民间信仰的传承，节会活动的“人山人海”是以信众、参与者为主体的；福建等大陆地区妈祖文化更注重文化遗产的文旅产业化开发，节会活动的“人山人海”是以仪式和内容的展演者和旅游、观赏者为主体的。妈祖文化传承发展的主体是在地民众的信仰、认同，传承发展的动力机制是精神慰藉，这就找到了妈祖信俗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能够得到传承保护、发挥其连结两岸和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心灵之通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重要作用的根本。

基于此，我们提出了“文化认同为核心、遗产保护为基础、民间交流为主体、产业发展为支撑”的发展对策，项目形成的研究报告，一方面报国家相关部门作为资政参考，一方面在《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报告》上发布，论文《海峡两岸妈祖文化遗产传承的比较与思考》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引起了两岸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

**刘：**您提出的“中国海洋文化类型论”“海上文化线路遗产论”“妈祖文化两岸纽带论”等观点，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很多观点已成为学科共识。能否结合具体的国际对话场景，就一些议题再作一下介绍和阐释？

曲：这些观点的形成，都源于对中国海洋文化本体本位的思考和对现实需求的回应，核心都是为了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确立中国海洋文化的自主认知和定位。这些观点前面已作了介绍，这里仅对海洋文化类型、海上文化遗产问题再略作回应。

### 中国海洋文化类型论：打破“海洋文明=西方文明”的偏见。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将海洋文明等同于西方的海洋霸权文明，认为只有西方才有真正的海洋文化，中国的海洋活动只是大陆文明的附属。这种论调歪曲了中国海洋文明历史，贬损了中国海洋文明形象，也影响了国内学界的认知。

我提出的“中国海洋文化类型论”，核心观点是：中国海洋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西方海洋文化以“扩张、掠夺、征服”为特征，是“霸权型海洋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以“交流、共生、敬畏”为特征，是“和平型海洋文化”。中华文明具有“海陆兼具、海陆融合”的特性，海洋文化是中华文明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观点的形成，离不开中西海洋文化、海洋文明历史大量的史料考证和对比研究，比如西方的“大航海”以殖民扩张为目的，中国的郑和下西洋以和平交流为目的；西方海洋贸易以垄断掠夺为手段，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与管理以互利共赢为原则；西方海洋信仰以征服海洋为核心，中国海洋信仰以敬畏海洋、祈求平安为核心。通过这些对比，可以看到两种海洋文化的本质区别。

### 海上文化线路遗产论：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提供理论支撑。

2010年前后，国家开始推动丝绸之路申遗工作，丝绸之路包括海上丝绸之路。但国际学界对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海上文化线路”亦即“文化线路”这一“海上类型”还缺乏认知和学术自觉，西方学者多将丝绸之路包括海上丝绸之路视为“贸易线路”，忽视了其文化交流联结的本质。因此，我提出了“海上文化线路遗产”的概念。

“海上文化线路遗产”是指人类在海上交流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合，包括中外海上政治联结、文化辐射、作为贡品与商品的海运、港口建设与管理、沉船、航海图、海洋信仰、民俗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多元文化元素，绝非单单是贸易线路，更是文明互鉴的纽带。现在，“海上文化线路遗产”已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概念，彰显了中国在海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话语权。我还提出海上文化线路遗产是跨国跨文化的区域性文化遗产、世界性文化遗产，需要国际共同保护共同传承的主张，相信这不但对于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是必要的，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暨“海洋命运共同体”也是重要的“共同文化”支撑。

刘：您长期关注国内外海洋文化研究的发展动态，能否谈谈您对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反思？

曲：从国内来看，海洋文化研究已从“小众领域”成长为“显学”，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理论深度不足，大多研究停留在现象描述，缺乏对核心概念、理论体系的深层建构；二是跨学科融合不够，海洋文化涉及海洋科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法学、教育学等多领域，交叉综合研究需要加强；三是现实回应性有待加强，部分研究与国家海洋战略、地方文化发展需求脱节。纯兴趣的、“学术”的研究是需要的，也是基础的，这毋庸置疑，但着眼、回应、服务现实发展需求的研究意义更大，同样毋庸置疑，而且需要、需求面更大更广。四是与国际学界、国家社会的对话与合作需要加强。国际学界、国际社会的观念、学术及其价值导向需要拨正，需要引领，这就需要与之加强对话，提升我们的国际对话能力和话语导向、引领能力。这些都是我们未来需要突破的方向。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

**刘:** 非常感谢曲老师的精彩分享。您三十余年的深耕细作, 引领、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者, 不仅构建了中国海洋文化的学科体系, 更以学术实践践行了文化自信, 为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树立了标杆。您的治学历程、学术坚守与未来展望, 将激励更多青年学者投身海洋文化研究, 为中国海洋文化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再次感谢您!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Liu Shuang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1-7640-1009>

Qu Jinliang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1-0978-2219>

###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曲金良:《再论古代“丝绸之路”的主体内涵及其历史定位》,《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卷,2019年,第46-51页。

[Qu, Jinliang. "On the Principal Connotation and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vol. 3, 2019, pp. 46–51. DOI: <https://doi.org/10.16497/j.cnki.1672-335x.2019.03.011>.]

——:《“海上文化线路遗产”的国际合作保护及其对策思考》,《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卷,2020年,第26-33页。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Protection of 'Maritime Cultural Route Heritage'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vol. 6, 2020, pp. 26–33. DOI: <https://doi.org/10.16497/j.cnki.1672-335x.202006003>.]

——:《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重建大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精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24卷,2014年,第54-65页。

[Qu, Jinliang. "Grand Strategy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Community around the China Sea: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Frontiers*, vol. 24, 2014, pp. 54–65. DOI: <https://doi.org/10.16619/j.cnki.rmltxsqy.2014.24.002>.]

朱雄, 曲金良:《“共同体”视野下的中国“海洋强国”建设》,《海交史研究》,第2卷,2022年,第60-68页。

[Zhu, Xiong, and Jinliang Qu. "China's 'Maritime Power'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Studies*, vol. 2, 2022, pp. 60–68. DOI: <https://doi.org/10.16674/j.cnki.cn35-1066/u.2022.02.008>.]